

《钏影楼回忆录》，包天笑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6月。

打开墨痕里的旧时光

王小柔



包天笑记录下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瞬间：“一双天足，穿了那种大脚裤裤子，背后拖了一条大辫子”。天足与辫子的并存，恰是新旧交替时代的生动写照。更富戏剧性的是，吴彦复让两位女儿拜薛锦琴为师，长女吴弱男后来竟嫁给了常来译书处的章行严。这种姻缘的巧合，在包天笑的笔下不再是八卦，而是文化交融的隐喻。金粟斋的灯火虽然微弱，却照亮了一代人的文化突围之路，从译介西学到倡导女学，从讨论名学到谋划革命，这个石库门里的小天地，恰是大时代变革的微缩景观。

旧时光里的性情中人

在包天笑的记忆相册里，清末民初的文人们以鲜活的姿态走来，每个人的身上都带着时代的印记。章太炎的“鸭屁股”发型与团扇是最醒目的标志，这位余杭学者“排满思想已塞满他的脑子里，但讲话还是那样温文迟缓”，用一口难懂的“余杭国语”谈古论今。包天笑记得，有人请他写扇子，他必用古艳的字体书写，而自己求写的名片，也成了案头的珍藏。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严复，他的金丝眼镜断了一脚，用黑丝线缚住，“虽为高级官僚，却有一种落拓名士派头”，在名学讲演会上，他站着讲了一小时，“平心静气，还说了许多谦逊话”，这种反差让包天笑看到了知识分子在新旧之间的挣扎。

马君武的痴与执最是动人。包天笑常见他“坐在人力车上，尚手不释卷咿唔不绝”，而他让母、夫人入女学的举动更成了朋友间的趣谈。“母云：‘我已五十许人了，何能再求学？’但君武固请，至于跪求”，最终太夫人“梳辫子作女学生妆，随少女曾入学数星期”。这种近乎偏执的劝学，在包天笑看来恰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心态：一面对旧礼教的叛逆，一面对新思想的痴狂。

吴彦复的家是文人雅集的舞台。这位“礼贤好客”的公子，家中常常“高朋满座，议论风生”，章太炎在此寄居，沈翔云、马君武、林万里等青年才俊在此会聚。包天笑记得，彦复送他一部《北山诗集》，他回赠再版的《迦茵小传》，竟引得彦复作诗相和：“万书堆里垂垂老，悔向人来说古今。”后来读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才知此诗背后藏着彦复如夫人彭媽“下堂去”的隐痛。包天笑的叙述从不刻意渲染，却于细节处见真章。当彦复的女儿吴弱男嫁给章行严后，包天笑在北京车站偶遇已是章夫人的弱男，“那时行严在沪大病，恰巧邵飘萍来车站送我，邻室的章夫人，还托邵君打电报到上海去”，这种时空交错的重逢，让当年登贤里的青年才俊成为时代的主角，而包天笑的回忆则成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

邱公恪与孟孟班的悲剧是文人命运的缩影。这对“青年伉俪，情好素笃”，却在短短数年间相继离世，“两人年均未届三十”。包天笑记得，公恪赴日习陆军，“但日本的那种军官学校，课务严厉，他虽意气飞扬，但体魄不能强固如北方健儿”，加上夫人难产而逝，最终抑郁成疾。叶浩吾的挽联“中国少年死，知己一人亡”与蒋观云的诗句“女权撒手心犹热，一样销魂是国殇”，将个人的悲剧升华为了时代的挽歌。在包天笑的笔下，这些早逝的文人不是历史的注脚，而是活生生的生命，他们的理想与幻灭，恰是那人精神困境的写照。

胡适之的冶游被《晶报》曝光的场景，则透着文人的狡黠与时代的宽容。当“胡博士”从北京来沪，即将出国时，被同乡余大雄撞见“在某处吃花酒”，这位“中国教育界的名人”的风流韵事立刻成了小报的头条。包天笑没有苛责，反而以略带调侃的笔触记录下这一“大报所不便登而不屑登”的新闻，仿佛在说：即便是新思想的倡导者，也难脱旧上海的风月场。这种宽容的笔触，让文人的形象更加立体。他们不是高不可攀的圣贤，而是有血有肉的凡人，在新旧道德的夹缝中，既想引领时代，又难舍人间烟火。

石库门里的微观叙事

包天笑的回忆录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旧上海的记忆密室。在他的笔下，城市的变迁不是宏大的叙事，而是具体到每条马路、每座建筑的微观记忆。从南京路的“大马路”到白克路的“新马路”，从张园的安垚第到登贤里的石库门，这些地理坐标不仅是空间的标识，更是时代的刻度。当包天笑说“那条马路在南京路的西北，当时还未定名，大家呼之为新马路，后来便定名为白克路，租界收回以后，又改名为凤阳路了”时，他实际上在记录一座城市身份认同的变迁，从殖民者的命名到主权回收后的更名，一条马路的历史恰是一座城市的殖民记忆。

张园是旧上海的公共空间样本。这座由张叔和(张鸿祿)用“宦囊”建造的花园，既是李伯元与包天笑晤面的场所，也是薛锦琴发表演说的舞台。包天笑记得，园内“有一厅，名安垚第，可容数百人”，当维新志士在此集会时，“一时鼓掌之声，有如雷动”。这种公共空间的形成，在包天笑看来意义非凡。它打破了传统士大夫的私密交往模式，让思想的交锋在开放的空间中进行，恰如园主人张叔和的命运，张园本身就是一个新旧交织的产物，在官僚资本与市民文化的碰撞中，催生出新型的城市公共生活。

石库门里的日常生活藏着城市的表情。包天笑描写金粟斋的迁移时，特别提到“后门相对的一家，便是吴彦复的家；在我们前面，有一片方塘，另外一带竹篱，便是薛锦琴女士的家”，这种邻里结构在旧上海非常典型——文人、志士、普通市民在同一弄堂里比邻而居，鸡犬相闻间，思想的火花便在不经意间碰撞。当包天笑看到章行严“携着吴彦复的两位女公子，到薛锦琴的家里去”拜师时，他记录的不仅是一次寻常的拜访，更是一种新型社会关系的形成——在石库门的有限空间里，不同背景的人打破了传统的阶层壁垒，构成了一个微型的现代社会雏形。

报馆与译书处的空间布局折射着文化生产方式的变革。《神州日报》的编辑室“既旧且窄”，“全编辑部只有吴瑞书一人包办”，而《晶报》的编辑室同时也是会客室，“有时少长咸集，群贤毕至，余大雄的朋友，张丹斧的朋友，朋友带来的朋友，如梁上之燕，自去来”。这种空间的开放性，与金粟斋译书处的“三上三下石库门式”的结构形成对比——前者是市场化的新闻生产，后者是精英化的思想孵化，两种空间形态共同构成了旧上海的文化生态。包天笑特别注意到，《申报》想收购《晶报》时，“一部《神州日报》遗传下来的平板老爷车机器，一副断烂零落的铅字本”并不值钱，真正想买的是“《晶报》二字而已”，这种对品牌价值的认知，恰恰说明上海的报业已开始显现现代商业意识。

城市记忆在饮食、服饰等细节中流淌。薛锦琴的“大脚裤裤子”与章太炎的“不古不今、不僧不俗的衣服”，构成了城市服饰的风景线，天足与辫子并存，和服与马褂同行，这种服饰的混搭恰是文化多元的象征。当包天笑说“那时没有穿西装的人，因为大家都拖着一条辫子”时，他实际上在记录一个微妙的过渡时刻：西装尚未普及，辫子仍未剪除，城市的服饰文化正处于新旧交替的阵痛期。

在《钏影楼回忆录》的字里行间，旧上海不是一个模糊的背景，而是有血有肉的主角。包天笑以报人特有的敏锐，从大马路的繁华到新马路的荒凉，从报馆的铅字到石库门的炊烟，以精准的视角捕捉到城市发展中的每个细节。当包天笑在钏影楼的昏黄灯光下搁笔时，那些沾着旧上海烟尘的记忆便永远封存在墨迹里。他笔下的铅字江湖、译书灯火、文人面影与石库门岁月，在历史的册页上留下深浅不一的痕迹。如今再看张园的安垚第早成尘埃，白克路的篱笆墙也换了新颜，唯有回忆录里章太炎的团扇、严复的断脚眼镜、马君武的人力车书影，仍在时光深处泛着微光，像老上海弄堂里未熄的灯，照着今天还在看这本书的读者。你会觉得，所有风云际会终成过眼云烟，唯有普通人在时代夹缝里的呼吸与心跳，才最真实。

在和解中彼此成长

杨朝旭

成长是与自己和解，而非匆忙的奔赴。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成长焦虑”如影随形，催促着我们快步迈向被定义的“大人世界”。马家辉与张家瑜合著的这部散文集是一部对生命、对自我审视的启示录，在娓娓道来中渐显温暖与深度，字里行间仿佛喃喃自语：不要急着在生活的道路上奋力长跑，而应该在漫长的旅途中学会与自己和解。与其说这是一部陪伴女儿成长的散文集，倒不如说是作者自己人生成长的体验，那句“你不必着急成为一个大人”表面上是送给女儿，实际上则是我们自己的心声。

在《我在春天和孩子有个约会》中，马家辉回忆陪伴女儿成长的过程，从最初面对婴儿时的手足无措，到后来与女儿同乐共玩，见证女儿从可爱的小公主，成长为有独立思想的个体。表面上是作者将对女儿的情感延伸到自己的学生和热爱的事业上，而字里行间所蕴含的如履薄冰的心态暗流涌动，恰恰反映的是作为现代成人的一种生存焦虑，女儿只是一面镜子，她照见了马家辉那种小心翼翼和处于无助的窘境，隐隐约约反映着作为大人的无力和恐慌——是我们自己内心不想成为大人而已。我们用温情和睦的场景淡化着内心深处对未知的担忧，只是女儿的出生及成长反而激活了我们藏在内心深处的不安，从而启动了作为父母的我们对生命叩问的程序，儿女，是我们重新认识世界的一个缘起。

书中一个看似平常的生活片段，成为一个隐喻。

当女儿痴迷欧洲发霉芝士时，马家辉却独爱中国腐乳。他剖析道：“腐乳承载着家族围坐的热闹记忆，而女儿独享芝士的孤寂身影，折射出独生子女一代的情感疏离”。耐人寻味的是，父亲最终捂着鼻子走进德国芝士店为女儿选购。这个充满妥协的行为往往被我们诠释为“爱意和理解”。散广对散丙说：“父辈的经验毕竟是过往，未必全对，子女的路还需自己去闯。”这不仅是对子女的期望，更多的是对我们自己的警示。因为爱，所以恐惧，只有和解，才能同行。而我认为，成人后的我们疲惫倦怠，如果不是有对子女的魂牵梦萦，可能会在滚滚红尘中迷失自己，为人父母应该学会。

张家瑜的文字则如涓涓细流，细腻地描绘出女儿成长过程中的点点滴滴，以及自己作为母亲内心的矛盾与挣扎。在《看你，听



《你不必着急成为一个大人》，马家辉、张家瑜著，花城出版社，2025年1月。

你》这部分内容里，她记录下女儿不同成长阶段的模样：两岁多有点嚣张、倔强，是爱调皮捣蛋的小女孩；青春期则是背离主流，不愿为考试与升学妥协、脸上总是带着愤愤不平之意的少女。面对这样的女儿，她有过失望，有过对女儿不能乖巧听话的无奈，但最终选择接纳与包容。她在日记中袒露心声，承认自己的失败，实则是惊叹于在我们的个体之外，竟然还有一个陌生生命的存在，并牵引着成人忽略那些宿命里的成长，但我们终归无法拒绝成长。这种蜕变体现出母爱的同时，也是成人通过儿女自我审视和从容面对人生的契机，在陪伴女儿成长的过程中，“母亲”身份也初具模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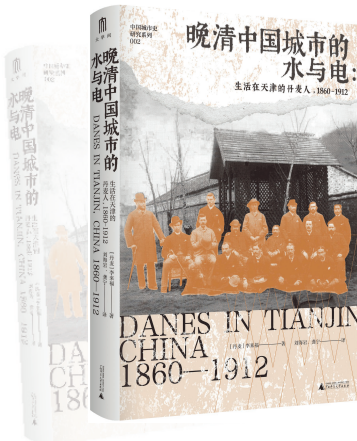
正如马家辉所说，“所以，你手里的这本书并不只是一父一母为孩子而写的文章。它更是自我叩问之书。当谈及孩子，文章的本意通常是为了探究生命的各种可能和不可能、各种快乐与伤感、各种前因和后果。这里面的思考与反刍，不仅是对孩子的，亦是对我们自己的，总之，我们真正想写的是，我们该如何成为我们，以及我在成为我们的过程里所曾感受的挫败、成长、满足、失望，以及我们曾经有过的笑声和流过的泪水。”

父母的身分终究不是雕刻刀，而是土壤——提供养分，静待花开，在时光的褶皱里，慢慢学会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每个生命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亦如京都古寺的银杏，有的叶子在十月金黄，有的等到十二月才翩然飘落。在不急于成为大人而又不得不成为大人的过程里，一同去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

摘自《晚清中国城市的水与电：生活在天津的丹麦人，1860—1912》，[丹麦]李来福著，刘海岩、龚宁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6月。

王小柔荐书

天津自来水公司的前世



新技术，但在天津当时的条件下如何运用该项技术，报告表述得还不清楚。会议经过审慎的考虑，同意采用天津自来水有限公司的方案，因为按照该方案建立的系统不太复杂，而且该技术存在已久，并经过试验证明效果良好。协议最终在同年4月28日的一次租地人会议上获得批准。

1897年10月，天津自来水有限公司开始建造水塔，输水管道主要是在1898年铺设完成的。1898年2月21日，公司注册和正式成立后举行了第一届天津自来水有限公司成员大会。1898年6月，举行了第一届公司年会，当选的工程师林德表示，希望能在1898年9月底开始供水。1899年1月1日，供水正式开始。

1899年8月，举行了第二届公司年会，董事会主席璞尔生说：“过滤后的水供给私人消费者，更为适合用于工业、洗浴，煮沸后也适合人们饮用。”同时，一些未经过滤的水则被出售给市政当局。所有27个消防栓都可以用于灭火，每个消防栓每分钟可以供水约1立方米，供水高度8—9米。同时公司正在考虑向英租界扩展界和其他租界供水。剩下的一个问题是废水的处理，这原本是那些运水人的工作，他们现在失去了一半的工作，所以废水处理的价格将会上涨。这会阻止一些潜在用户加入自来水供应系统，但另一方面也可能会促进将来对排水系统的投资。

1900年3月，天津自来水有限公司特别大会批准了与英租界扩展界工部局的协议，公司资本增加了350股，达到10万两银，并立刻发行200股以支付扩展界的投资。1900年5月到1901年4月的财政年度，公司首次出现大量盈余，并支付了20%的股息，或者说非常接近公司成立以来全部股本6%的股息。

1902年，天津自来水有限公司在英租界扩展界铺设输水主管道，并在夏末开始供水，同时还准备向法租界和德租界供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在璞尔生担任董事长期间，公司账目都显示出良好的经营效果。1907年6月，璞尔生卸任公司董事会主席。直到去世，他只持有6股天津自来水有限公司股份。

从1894年开始，英租界就准备筹建天津自来水厂。当时考虑有三种办法向天津供水：虽然自流并供水支持者的争论在报纸上持续了一整年，但与此同时，租界的外国技术人员和商人们已经开始筹划从河中取水供给租界的可能性。

1895年10月，天津自来水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投资10万两银，由发起人组成临时委员会，璞尔生担任临时委员会的主席。该公司的工程是由土木工程师司滕设计的。他曾指挥多个丹麦城镇自来水厂的建设。

天津自来水有限公司与英租界工部局开始接触始于1895年9月。1897年2月26日，天津自来水有限公司筹备委员会将报告提交给英租界租地人会议，报告提出自来水供给已经到了可以实施的阶段。筹备委员会随后提交了从欧洲来到天津的林德设计的天津自来水有限公司的修订方案，林德出席了会议并根据提议回答了相关技术方面的问题。作为筹备委员会的主席，璞尔生在中插话，就水的纯净度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人们已经饮用了多年，没有出现任何严重的流行病。专家们也高度评价了饮用水的质量。”

1897年4月14日召开了一次租地人会议，“审议与供水有关的提议”。除了天津自来水有限公司的方案，英租界工部局还收到了来自天津机压过滤水公司的提案。会议注意到，该提案与林德的方案非常相似，除了使用机器过滤水，这在当时还是很少见的